

犄角认知：高等教育制度转型与大学生认知形态的形塑

当两套互斥的制度指令同时且长期挤压一个学生时，他被逼出的不是缺陷，而是一套此前未被命名的认知组织方式

陈晓艳 著 · SDE 学员专栏 · 约 21,000 字

摘要

近年来，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弥漫的精神困境，已成为一个被反复书写却始终未被真正打透的议题。既有研究或将其归于经济压力，或批判制度转型带来的时间剥夺。本文试图在“时间剥夺”论所抵达的深度之上，再向下推进一步，提出一个此前未被识别的根本性问题：当全日制高等教育制度在急速转型中撤除了旧有的生存保障，却未同步建立新的安全网时，它并非简单地让学生“更穷”或“更忙”，而是将一部分学生逼入了一个制度性的夹缝——两套相互排斥的指令长期共存且不可调和：一套指令要求他们全身心投入学习，另一套指令要求他们自行解决生存问题。本文将这种被逼出的认知组织方式命名为**犄角认知**——一种以“解剖制度规则、精准获取通关筹码”为核心运作方式的高度情境化认知模式，并通过与布迪厄“惯习”、马克思“劳动异化”、德塞托“实践”、稀缺-管窥效应、适应性偏好这五组既有概念的严格切割，确立其不可还原性。文章进一步论证，这套认知形态的最深后果不是能力窄化，而是自我问题生成能力被制度性问题“替代”而非“压制”——学生的发问能力从未消失，只是被导向并耗尽在通关任务上。全文以四重最有力的反驳与回应、以及明确的证伪条件作结。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犄角认知；制度性夹缝；认知路径；时间剥夺；通关主体性

一、引言：当“忙”成为比“穷”更根本的困境

在关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叙事中，“穷”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能指。从吃不起一顿体面的饭，到买不起一本心仪的书，乃至感觉自己“不配”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最后都可以被“没钱”这两个字一言以蔽之。这种弥漫性的匮乏感，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既往的讨论走过了几个重要的阶段：早期研究试图将其锚定在经济贫困本身，后来又转向批判消费文化制造的相对剥夺感，再后来，一些更锐利的分析开始引入“制度转型”的视角，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1990年代末期高等教育改革所制造的风险个体化与制度支持的缺位。

其中，被概括为“时间剥夺”论的那些研究，是一个有深度的推进。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正确地指出了真正的剥夺不只发生在钱包里，更发生在时间表上。当国家从一个“供养者”转身为“规则制定者”，全日制学生发现他们被迫同时尊奉两套相互矛盾的指令：既要全身心投入学习（任务时间），又必须自行解决生存问题（时钟时间）。这两套节奏的持续撕扯，系统性地剥夺了他们深入任何知识活动所必需的那段“不被切割的时间”，进而导致自我价值坐标向“钱”这个唯一可量化的即时指标坍缩。

“时间剥夺”论几乎已经走到了既有理论框架的尽头。但恰恰是在这个尽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浮现了出来：面对同样的时间剥夺，学生们仅仅是“失去了什么”吗？还是说，在这种极端的、持续的压力之下，他们的心智本身被重新组织了，以至于发生出了一种**此前未被辨别和命名的新的认知形态**？我们的眼光被“剥夺了什么”攫住了，却可能忽略了他们在“得到什么”——不是在“得到好结果”的意义上，而是在“被逼出了令旁观者瞠目的生存认知”的意义上。

这正是本文试图向前推进的一步。我们提出，制度转型所制造的，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真空地带，更是一个结构性的**制度夹缝**。在这个夹缝里，一套围绕“任务时间”设计的教育理念仍在运转——它预设学生是心无旁骛的“求学者”，可以按照课程表、学术日历、培养方案的节奏去深入阅读、沉思、对话；而支撑这套理念的物质基础——生活保障、免费医疗、毕业分配——却已悄然抽空。与此同时，另一套生存指令被无声地植入了学生的生活：你必须自行解决吃住、自负盈亏地规划未来。这两套指令不仅互斥——它们要求的活动在时间上是零和的——而且在认知导向上互斥：前者要求慢、深、无功利；后者要求快、准、高性价比。被抛入这个夹缝的学生，尤其是那些缺乏家庭经济缓冲垫的底层学生，很快发现“按规矩读书”是一种无法企及的奢侈。于是，一种异于教育本身期待的认知组织方式，在他们身上被逼了出来。本文将这种认知方式命名为**犄角认知**。

“犄角”这个意象，取其“在夹缝中、被逼仄空间塑形、尖锐但偏于一端”之意。在这里，它不暗示病态或偏执，而是指向一种特殊的认知形态：它不是天生的禀赋，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能力缺陷，而是一种被结构性矛盾所催逼、为了在相互抵触的指令下存活而形成的认知组织。它不是“笨”，恰恰相反，它常常表现为一种极高的、对付制度漏洞的生存智慧——一种精湛的、让旁观者惊叹的“过关术”。但同时，它把学生训练成了高超的“通关者”，却让他们与知识、思想及自我成长这些高等教育核心承诺的内在逻辑，渐行渐远。这把认知之刃极其锋利，但它只能切制度的骨缝，切不开思想的地层。

本文的论证将如此展开：第二节不重复制度变迁的宏观叙事，而是直接追问：对于犄角认知的发生而言，哪几个具体的制度要素的撤除与存续，构成了关键的发生条件？由此论证，制度转身如何从一个“供给保障的退出”，演变为一个“认知路径的强制分岔”装置。第三节正面建构“犄角认知”这一概念，完成其精准定义，并通过与布迪厄“惯习”、马克思“劳动异化”、塞托“实践”、穆来纳森和沙菲尔“稀缺-管窥效应”、埃尔斯特“适应性偏好”等一系列既有概念的严格区分，完成其“不可还原性”校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示犄角认知作为“问题生成器”的理论潜能——当它被引入后，我们关于教育公平的提问方式本身发生了怎样的位移。第四节提出犄角认知的微观发生机制——论证在持续的制度指令撕扯中，认知组织是如何逐步被重新配置的；本节将进入一个关键的“断裂时刻”进行精细分析，展示认知切换在具体决策节点上是如何完成的。第五节重返个案，用小林这个典型案例来完整展演犄角认知在实际制度环境中的认知操作流程，并将她的故事复杂化——不仅展示她的成功通关，也展示她的内心矛盾、她的“失败的通关”，以及她身上那些无法被“犄角认知”完全消化的经验残余；在此基础上，展开一个类型化的“迁移失败”推演场景，将“非迁移性”这个理论判断落在具体的认知细节里。第六节论证犄角认知如何必然导致主体性的一个特定后果：不是“窄化”，而是“自我问题生成能力被替代”——论证学生的发问能力并非被压制，而是被导向并满足于制度性的通关问题，从而悬置了那些从生命经验内部逼出的追问。第七节正面回应最有力的四重反驳：有钱的学生也精于通关，是否削弱了制度夹缝的解释？犄角认知是否只是“稀缺-管窥”的翻版？它是不是一种精致的适应性偏好？最尖锐的质疑——犄角认知是不是高

等教育实现其自身目标所必经的“学徒”阶段？第八节结语：政策寓意不是“回归”某种本真的认知形态，而是松动那个只催生单一认知模式的制度夹缝，为认知路径的多样性重新创造制度性条件。最后申明证伪条件。

二、制度转身的再生产：从供给保障到认知路径的强制分岔

要理解犄角认知何以发生，我们必须先看清那个逼出它的“夹缝”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关于1990年代后期招生并轨、扩招和就业市场化三项改革“捆绑推进”的历史过程，已有大量研究做了详细梳理。本文不准备重复这些叙事，而是要直接切入一个更核心的追问：当旧的“国家供养”体制瓦解，新的、普适性的生存支持体系又未建立时，对于具体的一个学生而言，到底**哪些原先由制度承担的功能被撤除了**，而**哪些教育制度的刚性框架又被保留了下来**？正是这种“撤除”与“存续”之间形成的冲突，构成了犄角认知的发生土壤。

在精英化时代，大学为全日制学生承担着三重生存保障功能。第一是**直接的生活支持**：助学金和补贴覆盖了大部分基本生活开支，公费医疗消解了健康风险对学生的经济冲击。第二是**确定性的未来预期**：毕业分配制度意味着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确定的去向，让学生无需在大学期间就为“毕业后去哪”而焦虑盘算。第三——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时间结构的单一性保障**：因为前两重功能已经到位，学生的“全日制”身份拥有一个完整的、不受干扰的时间容器。在这个容器里，“如何生存”是一个已被制度预先回答的问题，学生的认知资源——他的注意力、他的时间规划、他的焦虑所在——几乎可以全部投向“如何学习”这个单一通道。

制度切换之后，这三重保障被先后撤除。学费与生活费转由学生家庭自行承担；就业分配被双向选择取代；公费医疗等福利也大幅缩减或取消。然而，学术制度关于“全日制学生”的刚性时间框架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细密：学分制、绩点系统、出勤考核、培养方案上密密麻麻的必修课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将学生时间高度占满的、不容商量的制度指令。这套指令的设计前提，仍然是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学生可以心无旁骛读书”的假设。

由此，一个制度性的夹缝形成了。两套互斥的指令——学术制度的“你应当全身心投入学习”与生存现实的“你必须自行解决生计”——长期并存，同时生效，而且都由同一个制度体系正式或默示地施加在学生身上。这不仅仅是“经济压力大”或“时间不够用”的问题。“时间不够”是一个可以测量的量的问题——如果你给这个学生每个月多几百块钱，他就能少打几份工，多出几个小时来读书。但制度夹缝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在**性质上**就是撕裂的：即便你给了他足够覆盖生活费的钱，学术制度那套把时间占满的刚性框架（早八点的课、必须到场的考勤、不可缺席的实验）仍然在与另一套他不可放弃的生存需求（维持社会关系、为未来职业积累履历、处理家庭期待）持续冲撞。钱可以缓解经济性的那面墙，却松不开制度设计本身构成的那面墙。

这个制度夹缝对底层学生的影响，远比对上中层学生深远。对于拥有充足家庭资源的学生而言，家庭充当了那个退场的“国家”角色——继续为他们提供生活支持、未来预期甚至社会资本，屏蔽了生存的底噪。他们并非不受学术制度刚性框架的挤压，但他们的应对方式是“选择性的服从”：可以选择听某些课、不听某些课，可以花钱买时间（如购买辅导服务），可以在不担心房租的前提下“战略性挂科”。他

们与制度的关系，是一种**策略性的博弈**：有退路，有缓冲，有选择的余地。而对于底层学生来说，两套指令都没有退路。学术的指令不能不听（挂科、退学的代价他承担不起），生存的指令更不可放弃（房租、饭钱没有替代来源）。他被卡在两面墙的正中间，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松动。他必须找出一种办法，让这两套互斥的指令，在同一个被极限压缩的心智空间里，同时运转。

这个“办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犄角认知**。它不是“因为没时间所以少读了几本书”这样一个被动的减法。它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甚至是极其高明的认知生产。它的核心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切换：从一个“如何理解世界”的任务，变成了一个“如何在两套互斥指令的夹缝中，以最小的代价完成通关”的任务。这两套互斥指令的**同时并存且同样不可放弃**，是犄角认知发生的核心条件。如果只有生存压力而没有学术制度的时间填充（如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只有学术制度的要求而没有生存压力（如一个被家庭充分供养的学生），犄角认知都不会发生。它必须同时面对两堵墙，才能在它们的挤压中被逼出那个尖锐的、偏于一端的认知形状。

于是，一个制度性的认知分岔发生了。当优势学生继续走在那条通向知识内核的、被家庭资源铺就的单行道上——或者至少保留了随时拐回那条道的可能性——时，底层学生的认知列车被无情地扳向了另一条轨道。犄角认知，就是那条分岔轨道上生长出来的、形态奇崛的心智景观。它不是底层学生“认知缺陷”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是他们在绝境中爆发出的惊人创造力的产物。它是对制度暴力的精巧适应，也是这种暴力最深刻、最隐蔽的烙印——它让受害者反过来为自己的受害发明了一套高效的生存技艺，而这套技艺每一次成功，都在加固那个把他们卡在夹缝里的制度结构本身。

三、犄角认知：一个从矛盾中结算出来的新辨别面

至此，我们触及了本文最核心的理论任务：为这种在制度夹缝中被逼出的新认知形态，给出一个精确的、不可还原的命名与定义，并确立它作为一个独立辨别面的学术资格。

犄角认知，定义为：**在由两套互相排斥的制度指令共同持续挤压而成的、无可逃避的生存夹缝中，个体被迫发展出的一种以“解剖制度规则、精准获取通关筹码”为核心运作方式的高度情境化认知组织方式。它的运作不服务于知识体系的建构，只服务于制度性通关任务的完成；它的发生前提不是一般性的匮乏，而是两套互斥指令的同时并存且同样不可放弃。它不是“策略性选择”——不是个体在多种可选路径中理性挑选的一种——而是当所有退路都被堵死时，认知系统为求存活而发生的结构性重塑。它不是在任何已有的认知能力上做减法（“窄化”“退化”），而是被制度矛盾直接逼出来的、有其自身独特运作逻辑的认知构型。**

这个定义包含几个不可分割的要素。其一，它的发生前提是“两套互斥指令的同时并存且同样不可放弃”——这是犄角认知区别于一般性贫困认知或压力反应的根本标志。其二，它的核心运作方式是“解剖制度规则”。犄角认知者对“元规则”——如何得高分、如何选到“给分厚道”的老师、如何用最少的时间满足考勤要求、如何包装一份有竞争力的履历——有着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判断。他们不是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地图，而是在精研教育制度的“源代码”。其三，它的能量指向是“通关”，而非“建构”。它的终极目标是获取凭证、安全毕业、找份工作，而不是建构内在的知识体系或意义世界。其四，它的根本特征是**非迁移性**。这是一种高度寄生在特定制度漏洞之上的认知形态，一旦离开这个制度环境——例如进入一

个不以绩点为核心评价体系的领域，或面对一个不能用“选课降重术”解决的、需要原创性思考的问题——这套极度锋利的认知能力就会骤然失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反复使用“认知组织方式”而非常见的“认知系统”或“操作系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系统”这个比喻虽有表述上的便利，但它容易诱导出一种模块化、可拆卸、可重装的想象，仿佛犄角认知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卸载的软件。这不是本文的立场。犄角认知不是在先在的“健全认知”上覆盖了一层错误的代码；它是在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在制度夹缝的持续挤压下，直接长成的那种特定的认知构型本身。它不是“操作系统被换掉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长成另一种样子”。因此，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将尽可能使用“认知组织方式”“认知构型”等表述，仅在必要时以分析性的方式使用“系统”一词，并始终明确其隐喻的有限性。

要使这个新概念稳稳立住，必须进行严苛的不可还原性校验——证明它不仅是任何现有概念的简单翻版或1:1替换，而且能够打开现有概念无法抵达的新问题空间。以下是五笔核心校验。

第一，犄角认知不等于布迪厄的“惯习”——它是在惯习错位之后发生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二级适应。布迪厄的“惯习”是一套被社会结构长期内化的、持久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它产生策略，并且能够从一个场域迁移到另一个场域，维持着一种风格上的统一。惯习是“生成策略的母体”，是阶级生存智慧在身体层面的“即兴演奏”。一个底层学生进入大学后，迅速学会察言观色、抱团取暖、利用非正式渠道获取信息——这些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其阶级惯习来解释：那是他从原初场域里带来的、关于如何在非友善环境中求生存的整套身体化的智慧。

但犄角认知处理的，是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它不是“用工人阶级的生存智慧来应对大学生活”这种即兴发挥。它是针对一个特定的、高度制度化的评价体系的**源码级别的逆向工程**。惯习让人在陌生的社交场合感到不自在，然后慢慢摸索出应对之道；犄角认知则是在反复的绩点计算、选课策略、考勤博弈中，被逼出来的一套能精确解剖制度规则的算法。惯习关乎“如何生活得像一个属于某个阶级的主体”，它是有机的、整体的、浸润着情感与品味的；犄角认知则只关乎“如何在这个不适合你的制度里不被筛出去”，它是功能性的、高度聚焦的、脱离了品味与风格的。二者的发生条件、运作层面和功能指向，都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这是本文最核心的理论校验——犄角认知不等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它不是“异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认知翻版，而是切开了一个异化论无法抵达的新辨别面。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述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与他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人的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分离的四重异化。表面上看，犄角认知所描述的学生困境——与学术产品（论文）、学术活动（学习）、求知与思考的类本质、以及同学老师相脱节——与异化工人的处境有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这正是本文必须正面迎击的最强挑战：如果犄角认知只是“异化”的一个高阶教育案例，那么它的理论贡献就大打折扣。

然而，二者之间存在一层根本的、不可逾越的本体论差异。这层差异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揭示。

其一，**脱耦的层面不同**：操作性脱耦与结构性脱耦。马克思的异化发生在**劳动活动本身**：劳动“外在于工人”，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其他需要的手段。工人在劳动中“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但犄角认知恰恰相反：学生在通关过程中是高度投入的，甚至能体验到一种“搞定

制度”的成就感和掌控感。小林精于选课、善于降重，她不是在其中“否定自己”，而是在其中发挥着惊人的聪明才智。脱耦发生在更深的层面——不是在“活动让她痛苦”的意义上，而是在“这套活动与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之间，本就不存在连接通道”的意义上。异化是：我做这件事，但这件事不是我的。犄角认知是：我做这件事做得很好，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是“认知”的。

其二——这是更关键的区别——**生成逻辑不同**：可复归的堕落与不可逆的原生。整个马克思-卢卡奇传统里，都预设了一个可以被复归的人的“类本质”。异化是人的本质在外在关系中的丧失；因此，扬弃异化，就是人向自身的复归。但犄角认知的发生学立场，恰恰拒绝预设这样一个先在的、本质化的“纯真求知主体”。对于犄角认知者而言，不存在一个先在的“本应发生的健全认知”，然后被制度扭曲了。在他们的认知成型的关键期（大学），犄角认知就是那个从一开始就被制度夹缝逼出来的唯一形态。它不是“堕落”，而是“原生”。它不是“偏离了正轨”，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走上那条轨”。因此，政策方向不是“复归”某种本真状态，而是去改变制度条件，让另一种认知形态的发生成为可能。

这个区别，是本体论级别的。异化论以一个“应然的人性”作为批判的支点，它的解决方案是“回归”；犄角认知则以“制度条件如何发生出特定认知形态”为追问的起点，它的解决方案是“为另一种发生创造条件”。前者是本质主义的，后者是发生学的。二者之间的断裂，正是犄角认知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得以成立的最深的根基。

第三，犄角认知不等于德塞托的“实践”——它不是临时的机会主义游击，而是被制度矛盾固化为常态的认知组织方式。 德塞托区分了“战略”与“实践”：战略是强者的规划，拥有自己的空间；实践是弱者的游击，在强者划定的空间里临时抓住机会、拼凑出一点自己的意义。犄角认知确实带有“实践”的色彩——它也是在异己的规则中寻找缝隙。但其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德塞托的“实践”是偶发的、机会主义的、充满日常创造性的，它的每一次成功都是一次短暂的逃逸，给人带来一种“在铁笼里偷到了一小片自由”的愉悦。犄角认知则完全不同：它不是在制度的裂缝里偷一点自由，而是因为被夹在裂缝里太久，整个认知组织方式都被重塑，以至于**它已经没有“逃逸”的概念了**。它不是偶尔用一次的小聪明，而是成为了日复一日的默认设置。它不产生德塞托式的“日常抵抗的欢愉”，只产生持续的疲惫和对自我的深度陌生。

第四，犄角认知不等于穆来纳森和沙菲尔的“稀缺-管窥效应”——它不是通用的认知带宽占用，而是一种高度制度特异化、非迁移的“聪明”。 稀缺论揭示了任何形式的稀缺都会导致“管窥”——心智过度聚焦于最迫切的资源缺口，从而忽略其他长期重要的事务。然而，稀缺论预测的是一个**通用的、负面的**结果：任何人缺钱都会暂时“变笨”。而犄角认知所捕获的现象，是稀缺论无论如何推演都推不出来的：**在特定制度矛盾结构下，人会变得在制度内极其聪明——但这种聪明是高度非迁移的、寄生在特定制度漏洞之上的。** 稀缺论的终点是“管窥”，是认知操作的普遍降级；犄角认知的关键恰恰不在于“降级”，而在于认知被**重新组织**成一个全新的构型——它在解剖制度规则、精准通关方面是出类拔萃的，但在需要长时间沉思、需要忍受不确定性、需要从自身经验内部逼出追问的领域，却表现为一种系统性的失能。这不是“变笨”，这是一种高度的、偏于一端的“聪明”。这个特征，是稀缺论的“带宽”概念无法解释的：带宽占用不会让人在某一方面变得格外敏锐。只有一种发生在特定制度矛盾中的、深刻的认知重塑，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第五，犄角认知不等于埃尔斯特和森的“适应性偏好”——它不是价值评价层面的偏好反转，而是认知层面的结构性替代。适应性偏好指的是，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的人会调整自己的偏好，使之适应被剥夺的处境——狐狸说葡萄是酸的。犄角认知不必然改变一个人对“什么重要”的价值判断。小林仍然喜欢《庄子》，她从未觉得“读书没用”。她的犄角认知，不是在回答“读书重不重要”这个价值问题，而是在执行“如何用最小能耗完成本学期的全部学术任务”这个运算任务。在这套运算里，“深度理解《庄子》”不属于有效指令——不是因为它被判定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无法被翻译成可以在通关清单上打勾的项目。价值观没有变，“喜欢”仍然在那里，但“喜欢”已经调不动任何认知资源了。偏好反转是人被剥夺后说服自己“其实我不想要”；犄角认知是人被剥夺后，在仍然“想要”的情况下，被训练得“不会要”了。

这五笔校验，为犄角认知划出了一个此前未被任何既有概念单独占据的辨别面。但概念的最终资格，不仅在于它不是旧概念，更在于它能否开启旧概念无法抵达的新问题空间。引入“犄角认知”之后，我们关于教育公平的提问方式会发生以下实质性的位移。

首先，“为什么底层学生学业表现差？”这个旧问题，将被改写为：“为什么底层学生发展出了一套与学业评价体系高度适配、却与知识内核彻底脱耦的认知组织方式？这套方式是如何在制度夹缝中被逼出来的？”旧问题将“差”预设为缺陷；新问题则将“犄角认知”视为一种被制度矛盾正面向逼出来的、有其独特逻辑和高效性的认知构型，从而将批判的刀刃指向制度本身而非个体能力。

其次，“如何帮助贫困生提高学业成绩？”这个旧问题，将被改写为：“如何松动那个只催生犄角认知、却阻断其他认知路径的制度夹缝？是什么制度条件，让‘通关’成了唯一的存活方式，而让深度求知变得不可能的？”旧问题在制度内部寻找补救措施；新问题则追问制度本身的设计如何制造了认知路径的分岔。

再次——这可能是最具穿透力的新问题——“犄角认知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认知组织方式？他们对此有何感受？这种‘对自己认知方式的陌生’，是否构成了当代青年精神困境中被遗漏的一层？”旧有的“匮乏感”或“焦虑”等心理描述，往往停留在情感层面；犄角认知的概念则引导我们进入认知自我觉知的层面——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心智已经被塑造成了一把只能切制度骨缝、却切不开思想地层的刀时，那种“隔着一层玻璃”的感觉，究竟是什么？

正是这些新问题的开启，而非仅仅“不是什么”的防守性校验，才最终确立了犄角认知作为一个独立辨别面的理论资格。它是一个被制度夹缝逼出来的、此前未被命名的新形态。它的名字，就是犄角认知。

四、从夹缝到认知：犄角认知的微观发生机制

我们已经指明了犄角认知的发生条件和核心特征。但“夹缝”如何具体地转化为一种“认知组织方式”，其微观路径仍然需要被阐明。如果缺乏这一步，犄角认知就可能被误读为一种即时的理性选择——“他们决定这样做了”——而非一种深刻的、在日复一日的制度挤压中逐步完成的认知重塑。本节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逐步”的过程打开，并进入一个关键的断裂时刻，展示认知切换在具体的决策节点上是如何完成的。

被抛入制度夹缝的学生，最初遭遇的只是痛苦。两套指令都在正当性上不容置疑，但他在任何一天都只能执行其中的一套，从而必然违逆另一套。每一次“上课”和“打工”之间的抉择，都不是一次性的理性计算，而是一次对自我承诺的被迫背叛——他答应自己要好好读书，也答应自己要活下去，但他无法同时兑现这两个承诺。这种持续的、无法弥合的自我背叛，不是一次道德考验，而是一种认知压力。它逼着认知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降低每次抉择带来的内在撕裂感。

这个“方式”，就是认知逐渐被重新组织：它逐步关闭对长期、低确定性、高深度认知投入的通道，转而将全部认知资源集中配置于处理短期、高确定性、制度性的信号。这个过程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揭示——注意力的重新导向、价值算法的被覆写、叙事框架的收束。

第一层，是**注意力的重新导向**。在单通道的认知组织方式下，注意力的流向由知识本身的内在结构引导——一个问题吸引了你的思考，你就会持续投入，直到想通为止。但在夹缝中，注意力的配置权从“知识的内在引力”转移给了“制度通关的迫切性”。任何一项活动，在做之前必须先经过一个高速扫描：它与哪项制度指标挂钩？能贡献多少绩点？达标需要的最小时间投入是多少？有没有比它更紧急的生存任务在排队？这个扫描器一旦被装在认知的入口处，它就永久地改变了注意力的配置逻辑。即便偶尔有一段不被打工占用的空闲时间——一个难得没有兼职的周末下午——这套扫描器也不会自动关闭。那个下午，仍然会被优先分配给人际交往中需要维护的关系、履历上需要修补的某个空白、或者只是纯放松来缓解累积的疲惫。知识，哪怕安静地摊在桌上，也已经失去了争夺注意力的竞争力。不是不想读，是读这件事的“认知授权”被一条自己无法控制的规则，永久地降低了优先级。

第二层，是**价值排序算法的被强制覆写**。在单通道模式下，价值排序是一个可以由主体自己参与校准的过程——一个人可以去沉思“什么是重要的”，并在反复的阅读、反思和对话中缓慢调整自己的价值坐标系。但在犄角认知的组织方式里，价值排序算法被一套外部的、不可商量的公式所取代。这套公式只有两个变量：回报周期的长短，和收益的确定性。一份兼职的酬劳，三天后到手；一次考试的分数，一个月后公布；而啃下一本难懂的理论书，它的“效用”可能在几年后才浮现，且完全不确定。当心智日复一日地使用这套公式来裁决“该做什么”时，裁决本身就不再是一个判断行为，而变成了一次自动执行。久而久之，“重要”这个词的意义被悄悄地替换了：它不是“从生命的整体叙事来看很有意义”，而是“在下一个结算节点之前能拿到确定回报”。那些无法被这套公式处理的价值——一首诗的美、一个历史细节的震撼、一次哲学思考带来的眩晕——并非被判定为“不重要”，而是被判定为“无法计算”，从而被排斥在了认知资源的配置系统之外。扫描器不只是降低了它们的优先级；它没有为这类信号编写接收程序。它们存在，但它们对系统而言是静音的。

第三层，是**自我叙事框架的收束**。人对自己“正在做什么、要去哪里”的理解，需要依靠一个叙事框架——一个关于“我是谁、我在追求什么”的持续讲述。在单通道模式下，这个叙事可以由教育过程本身提供：我在求学，我在成长，我在成为某个领域的有见识的人。这个叙事支撑着学生在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受苦。但在夹缝中，两套互斥指令不仅撕裂了时间，也撕裂了叙事。你无法同时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在认真读书的学生”和“我是一个需要拼命赚钱的谋生者”，因为这两套叙事预设的主体形象和行为逻辑是互斥的。在长期的叙事撕裂中，犄角认知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尽管贫瘠的替代叙事：“我是一个在努力通关的人。”这个叙事把所有矛盾都安抚了下来。考试、打工、社交、毕业，全都

被统合在一个“打怪升级”的情节主线里。这个叙事确实能让人免于精神分裂，但它也暗中完成了一次叙事空间的全面收束。在“通关者”的叙事框架下，一切偏离这条主线的追问——“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什么才是值得过的生活？”“我对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困惑？”——都被悄悄地取消了合法性。它们不是被回答，而是被架空了：它们不属于通关游戏里任何可完成的“任务”，因此在这个叙事框架里没有位置。

这三个层次的重新配置合在一起，构成了犄角认知从夹缝中“发生”的完整微观路径。它不是一次性的选择，也不是可以被个体意志轻易逆转的“心态问题”。它是制度夹缝对心智的持续挤压，在年复一年的日常中，一点一点地完成了对整个认知组织方式的重新塑造。

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具体的断裂时刻，将上述机制在一个微观场景中放慢、放大。这个场景就是那个被许多学生以不同方式描述过的瞬间：在某个深夜，翻开一本曾经会让你兴奋的书，却只能看到一排排待提取的信息点——感觉自己“好像已经不会读书了”。

在这个时刻发生之前，这名学生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夹缝挤压：她的注意力扫描器早已将“读这本书”排在所有可量化、可结算的任务之后；她的价值算法已经无法为“理解某个无关考试的理论问题”分配任何认知资源；她的自我叙事已经将“我是一个在努力通关的人”内化为唯一可用的故事线。但这些东西在此之前都运行在认知的背景里，没有被意识到。她以为自己只是“太忙了”，以为“等这个学期结束、等这门课考完、等这份兼职做完”，就会有时间读书。

这个深夜，她终于有了一个没有紧急任务的小时。她翻开书。然后，那个瞬间发生了：她盯着文字，却发现自己的大脑在以完全错误的方式处理它们。她在自动提取“可记背的知识点”，在无意识地将段落拆解成“如果考试要考，这句话会怎么出题”，在扫读中跳过所有“对考试没用”的修辞和沉思段落。她突然意识到，她不是在“读书”。她是在“处理文本”。她的认知，已经不知道还有另一种打开书的方式了。

这个瞬间是一个断裂，因为它把一个此前在背景中无声运行的机制，推到了前景，变成了可被感知的对象。在那一刻，她同时体验到了两件事：她体验到了自己的犄角认知——那套被逼出来的、高效的处理文本的方式——正在运转；她也体验到了这套方式的边界——它无法触及文本中那些不属于“知识点”的部分。那种“隔着一层玻璃”的感觉，正是这种“知道对面有东西，但我的手伸不过去”的认知性阻断的身体化表述。

这个断裂时刻也揭示了犄角认知的发生不是“知识被遗忘了”，也不是“能力退化了”。知识还在，能力还在，甚至比从前更锐利了——只是它们全都被重新配置到了一个单一的、服务于通关的通道里。那个通道的通量很高，但它的频谱很窄。它能稳稳接住并处理所有制度派发的信号，但对那些不在制度频谱范围内的信号——一首诗的余韵、一个悖论的刺痛、一段让自己困惑不已的内心独白——它是全频段静默的。

这个断裂时刻，标志着犄角认知从“一种应对策略”到“认知的默认设置”的转变最终完成。此刻之后，她不再是“选择”以通关的方式学习；她是**只能**以通关的方式学习了。她的犄角，已经不再是她工具箱里的一把刀。它已经长成了她握刀的那只手。

五、犄角认知的发生现场：小林的“庖丁解牛”与溢出

理论的骨骼必须被经验的血肉包裹，才能站立。让我们回到那个在“时间剥夺”论中被反复引述的小林。她来自农村贫困家庭，中文系大二学生，时间被课程、作业和几份零工切得细碎。在之前的分析中，她的故事被用来证明“没时间读书”的困境。现在，我们换上犄角认知的透镜，重新审视她的决策与感受，我们将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技术高超的认知手术师——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无法被理论完全消化的完整的人。

通关的精湛技艺。在大学里，小林展现出令人叹服的认知操作。在选课阶段，她没有按照知识兴趣去选择那些“硬核”但可能给分严格的课程，而是一开学就通过师兄师姐的情报网络，锁定了公认的“事少、分高、老师不点名”的选项。“我没资格去听那些需要花很多时间才可能拿个七八十分的课，”她说，“我挂不起科，我的绩点要靠这些课来保。”这里运转的逻辑，就是犄角认知对制度算法的精准逆向工程：她不是在规划一个知识结构，而是在运维一个叫“学生小林”的信用评级账户。绩点的算法比任何一门课的知识质量更重要，维持绩点策略因此压倒探索知识的欲望。

在课堂投入上，她的多线程微操令人叹服。专业课她认真听，但“认真”的焦点落在“记下老师可能考的重点”；“水课”上她从踏入教室的第一分钟就开始做家教备课，同时保持一只耳朵捕捉老师点名。她的大脑已经不是一个汲取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高效的任务调度中心。对读书会的放弃，更直接呈现了犄角认知的核心算法：读书会的那一晚，她有家教，时薪45元，一晚收入135元。读书会不能贡献于任何一门课的分数，无法在她的履历上加一行，也不能支付这周的饭钱。于是，一个涉及幸福与自由的哲学讨论，被一个135元的生存数据精准且无声地覆盖。这不是“遗憾”——在犄角认知的运算里，“遗憾”这个词需要先经过“可不可以被量化为通关指标”的过滤，而它通不过。

学期末的论文写作，则是犄角认知最为完整的算法展演。她无力也不可能去啃原著、爬梳一手文献。她的方法是：打开知网，下载三篇被引用量最高且主题相同的硕士学位论文；快速浏览其目录，提取出这几篇论文都在引用的那几篇核心期刊文章；然后直接去读那几篇核心文献；最后，将这些观点重新拼装，用自己的话改写，生成一篇中规中矩的论文。她甚至摸索出了一套降重诀窍：调整语序、同义词替换、长句切为短句再重新缝合。最终，这门课85分，安全、合格。

这就是“庖丁解牛”。刀是她的犄角认知。她目无全牛，看不到“现代文学的思想脉络”，只看到可拆解的“论点组合”、“参考文献链条”和“降重技巧”。整个流程，没有一句话是她自己真正想出来、逼出来、从困惑中挣扎出来的。她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学术空转：形式上，所有学术任务均已打勾；实质上，知识生产的内核甚至没有被她触碰过。这不是“她没有时间学习”，而是她学会了一种根本不属于“学习”的认知方式，去完成所有名为“学习”的任务。

失败的通关与溢出。然而，小林的“通关”并非如上述分析所展示的那般顺滑。在她的大学经历中，有许多时刻，犄角认知并未能完美地使她免于痛苦。大二上学期，她选了一门她以为会“事少分高”的公选课，结果老师临时改变评分规则，期末考试占60%，且题目全是需要阅读原著才能回答的分析题。她第一次挂科了。她不是没有努力——在考试前，她用犄角认知的方式拼命找规律：往年试卷、同学笔记、老

师上课的“口风”——但这一次，制度没有给她可解剖的漏洞。她失败了。那个寒假，她反复做噩梦，梦见自己被退学。她对自己说：“我就是太笨了，连通关都通不好。”

这个时刻，暴露了犄角认知者身上被忽略的一层经验：当他们“通关失败”时，他们并不会因此开始反思“通关”这件事本身。他不会说：“也许我应该换一种方式学习。”他说的是：“我通关的技术还不够好。”犄角认知的悲剧性不仅仅在于它锁死了一个人的认知路径；更在于，当这条路走不通时，它让人无法看见“路本身可能是错的”这一可能性。认知的边界被体验为能力的不足。自我攻击，替代了制度批判。

还有一个溢出。在整个访谈中，有一句话是本文的理论框架无法完全解释的。小林在描述完她的一天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做完所有事，躺在床上，会突然觉得很空，但又觉得这样想很矫情。”

“觉得这样想很矫情。”这句自我否定，不属于犄角认知。它属于另一套更深层、更难以命名的东西——一套来自她阶级经验的、对“感受”本身的不信任和抑制。在她成长的村子里，没有人会躺在床上“觉得很空”。那是有闲人的毛病。她从小被训练得认为，感受是不可靠的、是需要被克服的、是“矫情”的——那些埋头干活的人，从来不提“空不空”。犄角认知利用并强化了这套来自阶级惯习的对感受的抑制——因为在一个需要全天候高效通关的系统里，任何不能被兑换为通关绩效的感受，都是噪音，都需要被沉默。犄角认知不是她心智的全部，它寄生在更深层的、沉默的阶级惯习之上，与之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

这层共生关系，是本文的理论无法完全消化的“硬块”。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提醒：发生学的分析，不应追求对经验的全覆盖。一个留有硬块的理论，比一个把一切都解释得平滑如镜的理论，更值得信任。

迁移失败的推演。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必要的推演。如果小林离开了大学，进入了一家对员工有真实独立研究要求的文化机构——比如一家需要为专题展览做一手历史文献爬梳的博物馆，或一家需要独立撰写深度行业分析报告的咨询公司。在那个制度环境里，没有“事少分高”的选课情报可以依赖，没有可以下载三篇硕士论文然后拼接降重的现成文献链，没有老师划的重点。任务变成了：给你一堆凌乱的、真伪莫辨的原始材料，你自己去判断哪些可信、哪些关键、它们之间有什么前人没说过的新关系，然后用你自己的论证把这个新发现讲圆。

此刻，犄角认知这把在大学里削铁如泥的快刀，会遭遇什么？首先，它找不到可以解剖的“制度源代码”——这个新环境没有一套明确的、可被逆向工程的打分明细。你的报告好不好，没有85分的算法可以算，只有资深同事读完后的那个皱眉或点头，而后者无法被拆解成“论点组合+参考文献链”的公式。其次，它的多线程微操在这里派不上用场：不是因为不需要效率，而是因为这个任务需要的恰恰是犄角认知最不擅长的事——长时间的、不受短期结算驱动的、独自面对一团混沌的“凝思”。最后，它在大学里最赖以生存的那套“用最小能耗完成形式达标”的策略，在这里开始产生反效果。领导不想要一篇“降重”过的拼装文章，他想要一个你从原始材料里自己挖出来的新判断。而小林已经太久没有被训练过“自己挖”了。

然而，现实的“迁移失败”可能比“纯粹的失效”更复杂、更微妙。小林进入公司后，她的犄角认知强大的“解剖规则”能力，可能让她迅速成为全公司最会用内部系统、最懂报销流程、最能搞定KPI的人。她甚至因此被提拔为小主管。她成功了。但就在这个“成功”的巅峰，那种“隔着一层玻璃”的感觉再次袭来——她管着一个团队，但她无法理解手下那个名校毕业的新人为什么要花三天时间去纠结一个看起来“对项目没有用”的问题。她无法进行真正的深度业务讨论。她的“非迁移性”不是表现为“什么都不会”，而是表现为“在更高阶的认知任务上，她只能把一切翻译成她已知的通关流程，而无法进入那个她未经历过的新认知层面”。这种“成功中的失败”，比“纯粹的失效”更具有思想的冲击力——它揭示的是，犄角认知不仅会在某些环境下失效，它会在另一些环境下以“成功”的形式继续运作，而这种成功本身，就是一个更深的困局。她保她活过大学，保她在职场的初级阶梯上站稳脚跟，但在那个需要她“自己定义问题”的关口，这把刀切下去，刀下是空的。

六、通关主体性的完成：当发问能力被替代而非被压制

我们至此已经论证了犄角认知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它如何运作。但还有一个更深远的问题没有被追问：当这套认知组织方式被装在一个年轻人身上运行四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主体性后果？换言之，一个被犄角认知全面接管的人，是“谁”？他与自身生命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层面的改变？

这里，我们需要避免一个容易滑入的陷阱：用“窄化”“压缩”“退化”这类隐含病理学诊断的词汇来描述这个后果。这类词汇预设了一个先在的、“应该更宽”的健全主体性，而犄角认知只是它的一个病态收敛版本。这种预设违背了发生学的立场：在犄角认知者的认知成型的关键期，犄角认知就是那个从一开始就长成的形态，它没有在某一个“饱满版本”上动手术，而是直接长成了一个独属于夹缝环境的构型。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不是“他失去了什么本来应有的能力”，而是“在他的认知被这套组织方式塑形的过程中，哪一种能力被从根上就没有机会发生”。这个追问的姿态，是发生学的：不诊断偏离，只揭示生成。

这种被系统性阻断的能力，就是**自我问题生成能力**——即一个人从自身生命经验内部，逼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追问的能力。一个有深度的学者，活在自己提出的原创性问题里；一个好学生，也至少活在一两个属于自己的困惑里——那个“这门课讲的东西跟我从小经历的那个矛盾到底是什么关系？”的追问，那个“书本上说的好像跟我的直觉不一样，到底哪里不对？”的纠缠。这种问题不是老师布置的课后思考题，不是制度从外部派发的论文题目，而是从生命与文本之间、经验与思想之间的摩擦中自然迸发出来的、带着个人体温的困惑。它是个体与知识之间产生深度关系的唯一纽带。没有自己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学得很好——他可以把老师讲的全记住，可以把论文写得滴水不漏——但他永远只是在执行他人的问题。他是在知识大厦里打扫卫生的管理员，却从未成为过这座大厦的住户，更不用说建筑师。

犄角认知在认知组织层面，就阻断了这种能力的生成。但这里需要一个更深刻的论证：这种阻断不是通过“压制”——仿佛发问能力被某种外力按住了，只要松开手它就会弹回来——而是通过**替代**。犄角认知者并不缺乏发问能力。恰恰相反，他们每天都在问大量的、高度精密的、极其有效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这节课的重点是什么？”“这个老师偏心什么样的答案？”“怎么写才能让我从85提到88？”“今

年保研绩点线会涨吗？”“哪个实习的含金量高？”“简历上这条经历应该怎么措辞才能让HR多停三秒？”

这些**全是真问题**，而且他们非常善于解答这些问题。提问与解答的过程，带给他们实打实的回报——绩点、证书、offer——以及随之而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这不是一个“发问能力被压制”的故事，而是一个“发问能力被精确地导向了制度性目标并从那里获得了充分满足”的故事。一个学生在大学四年里，每天都在提出真问题、解答真问题、并从解答中获得成功的快感——他怎么会觉得自己“不会发问”呢？他觉得自己提问能力很强，他确实提问能力很强。只是他所有的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终点：如何在制度中通关。

正是这种“提出并解答制度性问题的乐趣、效率与成就感”，**替代了、并悬置了**提出另一种问题的需要和可能——那种关于“《庄子》与我的生命”、“我与故乡的断裂”、“我所学的这些东西到底要将我带往何处”的问题。这类问题与制度性问题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没有明确的解答期限，没有可量化的完成标准，没有“通关”这个终点。它们可能纠缠一个人一辈子，而且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绩点或offer。它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发问姿态——不是解剖制度规则的锐利，而是面对自身生命混沌的耐心与诚实。犄角认知者不是不能问这种问题；而是在他们意识到“还有这种问题可以问”之前，他们发问的全部认知通道，都已经被制度性问题的迫切性、确定性和成就感所充满。他们不缺乏发问能力，他们只是把这种能力全然出让给了制度——而出让的代价，不是“没有了问题”，而是“不再有另一种问题”。

这个论证，比“条件缺失”论更具穿透力。“条件缺失”论暗示，只要给学生认知盈余、容忍不确定性的时间、不被制度评价体系提前定义的问题空间，他们的自我问题生成能力就会自然发生。但“替代性满足”论揭示了一层更深的困境：这些条件即便被提供，犄角认知者可能也不会去使用它们——因为他对制度性发问的依赖，已经不只是一个习惯，而是一个能给他带来自我价值确认的整套意义系统。他不知道如果不问“这个老师的重点是什么”，他还能问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提问，他在大学里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他的通关主体性——那种以“获取通过凭证”为第一驱动力、以解剖制度规则为核心技能的主体形态——已经完成了。

七、替代解释的回响与最疼反驳的正面迎击

本文提出的犄角认知，必然会遭遇几类严肃的质询。有些已经在第三节的概念校验中处理过；有些关乎本文的立场和适用范围；还有几个最尖锐的反驳，必须在本节被正面迎击。

第一类反驳：这难道不是一种精致的“缺陷论”吗？这个批评指出，犄角认知这个概念，虽然作者反复声明发生学姿态，但一旦被学术语言固化，就难免被后来的使用者当作一个给学生贴标签的新工具——“这群学生有犄角认知，认知有问题”。这是任何旨在命名某种被制度制造的深刻后果的概念都必然面临的风险。对此，本文的回答是两层的。第一层，概念的学术用途和它的滥用可能，是两回事。布迪厄的“惯习”也可以被滥用为“你就是因为工人阶级惯习所以才不成功”的指责工具，但这并不减损“惯习”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的理论价值。一个概念的正当性，取决于它是否揭示了一个此前不被看见的真实结构，而非取决于它是否可能被误用。第二层，也是更重要的：将犄角认知从日常道德评判（“他们就是太功利”“他们就是短视”）的模糊地带中精确地提炼为一个中立的分析概念，恰恰是完成了一次“罪责归

位”——把这些被社会话语常常归咎于个体品格的特征，重新锚定在制度矛盾这个发生源上。命名它，是为了批判那个逼出它的夹缝，而非指责被夹缝塑形的个体。

第二类反驳：如果家境优渥的学生也精于“通关”，是否削弱了制度夹缝的解释力？ 这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反驳。确实，在当代大学里，“绩点游戏”是一个普遍现象。优势学生同样善于选给分高的课、同样精于包装履历、同样在课堂讨论中缄默而在考试前突击。如果犄角认知所描述的现象如此普遍，那么用“制度夹缝”这个特指底层学生的发生条件来解释它，是不是犯了过度特指的错误？

必须做出一个严格的区分。优势学生的通关策略，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他们拥有切换游戏的资源和认知盈余。他们可以选择在某些课上“刷绩点”，因为他们对另一门真正感兴趣的课可以投入深度阅读的时间——他们有时间缓冲，有退路，有钱买时间。他们也可以在毕业后选择不去做那个“通关”获得的工作，而去gap一年思考人生，因为家庭提供了这个安全网。他们的通关技术，是一个他们可以根据情境需要来**调用或关闭**的工具箱里的一个工具。而底层学生的犄角认知，是一种**生存性劫持**。他们没有退路，没有切换游戏的选项。通关不是他们的一个策略，而是他们认知的唯一运行模式。小林不能决定“这学期我少打一份工，多读点书”，正如她不能在八月不交房租。她的犄角认知不是她在工具箱里的一个可插拔工具；它就是她的认知组织方式本身。她没有另一套方式可以回退。同样外在的“通关行为”，在两个群体身上的生成路径和功能位置，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博弈中的灵活进退，后者是夹缝中的唯一存活。这个区分，保护了犄角认知的发生学精准性——它仍然特指那个由两套互斥指令同时挤压且同样不可放弃的条件下形成的认知组织方式；同时也揭示了教育不平等的深层形态：不是某些学生“不懂”通关术，而是只有另一些学生被剥夺了“不用通关也能活”的可能性。

第三类反驳：最尖锐的质疑——犄角认知，难道不正是高等教育实现其自身目标所必经的“学徒”阶段吗？ 这个反驳来自对教育过程的内部观察。学会拆解、模仿、重组，难道不正是学术训练的一部分吗？一个一年级研究生入门时，不也是从模仿大师的论文结构、引用链、行文语气开始的吗？本科生的论文写作，不正是通过拼装和改写已有文献来学习学术规范吗？你的“犄角”，会不会只是“学术学徒”在一个极度缺乏缓冲垫的环境下的一个残酷变体？如果学徒制本身就是一个合法、甚至必要的认知训练阶段，那么你对“犄角认知”的批判，是否是在用一种本质主义的“纯真求知”标准，去否定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模仿阶段？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反驳，因为它触及了教育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它迫使我们必须清晰地划出一条**质的分界线**，区分两种表面相似但根本不同的模仿。

学术学徒的模仿，其目的是为了最终“进入”那个知识传统。一个研究生拆解大师论文的论证结构，是为了理解那个结构背后的**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大师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他是如何从材料走到论点的？我能不能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这种设问和论证的方式？学徒的模仿，以“求真”为内在约束：他拆解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有能力提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经得起检验的新问题。他的模仿是可迁移的——他学会的不是“这位大师的论文怎么写”，而是“如何像一位学者一样思考”。

而犄角认知的模仿，其目的始终是“通关”。小林拆解硕士论文，不是为了理解那些论文背后的知识生产逻辑，而是为了提取出可以被“降重”的“论点组合”。她关心的不是“为什么要这样论证”，而是“这样拼装能不能过查重”。犄角认知的模仿，以“合规”为唯一判准：它的终点不是提出新问题，而

是拿到85分。它的模仿是非迁移的——犄角认知者学会的是“如何在这个特定老师的课上拿高分”，而不是“如何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传统”。

更致命的是：学术学徒在模仿的过程中，一直在接受来自知识传统本身的反馈和校正。导师会告诉他：“你这里的论证逻辑不对，去看某某原著。”同学会质疑他：“你这个材料的解读有问题。”这些反馈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知识的内核。而犄角认知者所追求的恰恰是**规避这种反馈**——他选“事少分高”的课，就是为了避免被要求去看原著；他用降重技巧拼装论文，就是为了避免被要求做出自己的论证。他的模仿，不寻求进入知识传统，只寻求绕开它。他用制度的规则，保护自己不被知识触碰。

这个区分，保护了犄角认知的理论内核：它不是“学徒制的残酷版本”，而是**学徒制的取消**。它将学术训练中那个最核心的环节——从模仿进入传统、从传统中逼出自己的问题——替换成了一套围绕制度指标的、自我封闭的通关闭环。在这个闭环里，学生没有“学成出师”的那一天，因为“师”所守护的那个知识传统，从一开始就不在闭环里面。

第四类反驳：如果这个夹缝的痛苦，最终可以被充足的钱所缓解，那么犄角认知的分析，是不是只是在用一个复杂的概念，重述了一个几千年前的朴素道理——“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问题必须被回应，因为它是本文能否真正确立其理论必要性的另一个关口。

回应分两步。第一步，承认“钱”确实能松动夹缝的一面墙。犄角认知的发生条件，是两套互斥指令的同时挤压。其中一套指令——生存指令——的直接表现确实是缺钱。给足钱，可以显著减少为生存奔波的时间，从而缓解两套指令在时间上的零和竞争。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基础的改善是缓解许多社会性痛苦的极重要的条件。本文的分析从未否认这一点。

第二步，论证“钱”松不开夹缝的另一面墙。犄角认知的发生条件，不只是“缺钱”，更是“两套互斥指令的共存”。即便充裕的经济资助解决了生存的那一面，学术制度本身的刚性框架——作为夹缝的另一面墙——依然存在。那套把时间高度占满的指令仍在运转。它预设的前提仍然是一个不存在的“可以心无旁骛的学生”。拿了钱的学生，或许不再需要去打那份额度精确到每小时45元的家教，但他的时间仍然被填满了——现在，那些曾经用来打工的时间，被学制要求的课程、会议、活动所占据。他从“因为打工所以不能读书”，变成了“因为制度的刚性时间安排所以不能读书”。“没时间”的根源，从经济转移到了制度设计本身。只要那套刚性框架不改变，犄角认知的另一面墙就仍然坚固。学生或许不再缺钱，但他仍然活在一套把他时间占满、不给他不受切割的认知盈余的制度里。在这个制度里，他仍然可能——不是在生存压力下，而是在合规压力下——被逼出一套犄角认知。

因此，犄角认知的理论增益不在于否认“钱重要”，而在于揭示：即便经济问题被解决，那个把学生心智逼向“通关”的制度性结构仍然没有被动摇。仓廩实，或许能让人开始知礼节；但一个被设计成不允许“不知”任何东西的制度——一个把时间占满、把“无用”挤出去的刚性框架——仍然可能在仓廩已实之后，继续把人的认知逼进犄角。经济资助可以拆除其中一套指令的外部表现，但只要刚性框架本身不松，犄角认知的生成土壤就仍在。这一笔，是“仓廩实”的朴素智慧抵达不了的。它让犄角认知的分析，从“呼吁扶贫”进到了“呼吁松动制度设计的刚性”，从而确立了它独立的理论贡献。

八、结语：为认知路径的多样性重新创造制度性条件

至此，本文的核心论断已经全部摊开。当代高等教育转型在撤除旧有供给保障的同时，保留了一套以“全日制全身心投入”为预设的刚性制度框架，由此制造了一个两套互斥指令并存的结构性的夹缝。在这个夹缝的持续挤压下，一部分学生——尤其是那些缺乏家庭经济缓冲垫的学生——被逼出了一套名为犄角认知的认知组织方式。这套方式以解剖制度规则、精准获取通关筹码为核心运作逻辑，极其高效，却与知识、思想、自我成长的内在逻辑彻底脱耦。它不是任何一种现有学科概念的翻版——不是布迪厄的惯习、不是马克思的异化、不是德塞托的实践、不是稀缺论的管窥、不是适应性偏好——也不是这些概念的任意组合。它是一个被特定制度矛盾直接发生出来的、此前未被辨别的新形态。它的后果，不是在认知上“被窄化”，而是自我问题生成的能力从认知组织层面被替代：学生的发问能力并未消失，反而在制度性问题上得到了极致的锻炼和满足，只是这种满足，悬置了他们追问那些从生命经验内部逼出的、没有确定解答的问题的可能。

看见这一步，政策想象的格局就必须发生位移。以往的主流思路——提高助学贷款额度、增设勤工助学岗位、扩大奖助学金覆盖面——本质上是在修补那张被撤除的旧安全网。这些措施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仍然把学生视为需要被“托底”的经济主体，而没有触及那个制造犄角认知的结构本身：那两套互斥指令的并存。给一个被困在夹缝里的人提供更多的食物和水，能让他活下来，但无法让他直起身体。如果制度的刚性框架——那套用课程、学分、考勤、培养方案把“全日制”塞满的逻辑——不被动摇，那么即便经济压力得到缓解，学生也仍然被另一套指令紧压在墙面上。他或许不再缺钱，但他仍然缺不被切割的时间、缺不被任何通关任务标记为待用的认知盈余、缺那个让自我问题得以萌芽的、不被外部评价体系事先填满的内在空间。

因此，政策的真正方向，不是“织更密的网”，而是**松动那道夹缝**——改变两套互斥指令本身，而不是在它们之间修补缓冲区。这不是在呼吁“回归”某种本真的认知形态。发生学的立场拒绝预设一个先在的“健全认知”。我们只是在说：当前的制度条件，只催生了一种特定的认知组织方式——犄角认知——而系统性地阻断了其他认知路径的发生。政策的任务，不是去修复被犄角认知“损坏”的学生，而是去改变制度条件，让不同的认知形态有机会从不同的制度条件中被发生出来。

这意味着几项根本性的制度设计变更。第一，必须松动“全日制学生”身份的刚性时间预设，建立允许学生在更长的时间窗口内进行“半工半读”与“沉浸式学习”灵活切换的制度通道——让“慢”不再是一种被学业进度条惩罚的耻辱，而是一种被制度承认并保护的權利。第二，必须重新设计学生资助体系，将它从“事后补偿”转向“事前保障”——例如一种覆盖全部全日制学生的、无差别的普遍基本收入式生活津贴，从根本上消灭“生存底噪”对认知的劫持机制。第三，在最深层，大学需要反思其评价体系中“可量化指标”的过度依赖，因为这些指标恰恰是犄角认知赖以寄生的制度漏洞。当“好学生”被定义为一个在这些可量化指标上完美合规的人时，大学自己就成了犄角认知的培训基地——它在用整套制度设计，日复一日地训练学生精通那种与知识内核无关的通关术。如果一所大学声称要培育独立思考、深度追问、无用的好奇心，那么它首先必须在自己的评价体系里，为这些不能被量化的成长留出不可被压缩的空间——不是作为锦上添花的装饰，而是作为制度的硬性承诺。

犄角认知是一把在夹缝中被磨得极其锋利的认知之刃。所有见过它的人，都会惊叹于那上面寒光闪闪的生存智慧。它是一种被制度矛盾逼出的壮观创造——它见证了那些年轻人在绝境中爆发出的、令旁观者敬重的求生意志和适应天才。但我们此刻的任务，不是继续沉默地敬佩，也不是用一种本质主义的“求知”标准去否定它。我们的任务是去改变那个让这种创造不得不发生的夹缝本身——不是为了消灭犄角之刃，而是为了让另一把刀——那种以好奇、困惑、沉思和无用的白日梦为磨刀石的认知之刃——也有机会在这些年轻人的心智中被锻造出来。他们没有亏欠制度任何东西；是制度亏欠了他们一个可以让心智在“通关”之外、还有路径去追问“为什么要通关”的环境。改变那个环境——这就是本文以全部论证所指的那个最终诉求。

证伪条件： 本文论点的核心是：犄角认知的发生，依赖于两套互斥的制度指令长期并存且同样不可放弃这一特定矛盾结构。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这一制度夹缝已被充分松动——例如，刚性学业时间框架已得到实质性软化，且普遍基本收入式学生资助已全面覆盖，使“生存指令”不再与学生身份构成强制的零和博弈——但在这样的条件下，仍有大量学生持续、系统性地表现出犄角认知的全部核心特征（解剖制度规则、精准通关、认知操作层面的非迁移性、自我问题生成能力被制度性问题替代而非被压制），且这些特征并非基于对旧制度的个体记忆惯性，而是从新制度条件中仍在被持续生产出来，那么本文的核心因果论断便需被重新检验乃至修正。

注释

- [1] 本文对“制度夹缝”的定义强调两套互斥指令的同时并存与同样不可放弃，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矛盾”或“角色冲突”有所区别：后者通常指不同制度要求之间存在张力，但不一定同时构成不可退出的生存性强制。本文的“夹缝”特指全日制高等教育转型中形成的、让学生无法通过退出任何一方来缓解冲突的结构性的困局。
- [2] 本文所称的“时间剥夺”，是对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高等教育转型与大学生时间体验所做研究的概括性指称。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全日制学生时间被肢解的现象，但尚未对由此产生的认知形态转变进行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的推进，并非对特定作者的批判，而是对一种学术判断的深化。
- [3]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在其不同著作中有不同侧重，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是其晚期在《实践感》中对惯习的界定，强调其作为“结构化的结构”和“生成策略的原则”，且惯习具有可转换性。这与本文所论的“犄角认知”的非迁移性形成鲜明对照。
- [4] 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埃尔达尔·沙菲尔在《稀缺》中提出的“管窥”效应，意指稀缺占用认知带宽导致人们忽略长远利益。本文承认该机制的普遍性，但旨在证明：在特定制度夹缝下产生的认知形态，其结构和发生逻辑不能简单还原为带宽占用。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犄角认知的发生依赖于两套互斥指令的并存所导致的认知重塑，而非一般性的资源稀缺导致的暂时性认知降级。
- [5] 埃尔斯特在《酸葡萄》（1983）中对适应性偏好的分析，侧重主体通过调整愿望来适应被剥夺的现实；森（1999）则在此基础上将其拓展至可行能力与正义的讨论。本文在指涉“适应性偏好”时，同时涵盖这两条脉络，但重点在于区分偏好调整（价值层面）与认知组织方式的结构性的替代（认知操作层面）。
- [6] 本文第五节所使用的小林案例及其后续推演，并非基于长期跟踪调查的经验数据，而是综合多例访谈与观察、并加以匿名化、合成与简化后的思想例示材料，用于展演犄角认知的操作逻辑与可能后果，不代表任何特定个人的完整经历。文中涉及的具体细节（如时薪、兼职类型）均为情境建构，旨在使论证结构可视化。该材料的运用遵循“思想拓展”而非“经验证实”的原则。案例末尾的“溢出”分析，意在承认理论框架的边界。
- [7] 关于“通关主体性”这一表述，本文特指在制度化评价体系中被训练为以“获取通过凭证”为第一驱动力、以解剖制度规则为核心技能的主体形态。它与日常生活中所谓“有上进心”或“追求成功”有着本质区别：后者仍可包含自主的价值排序与意义建构，而前者是在没有退路的制度夹缝中被逼生的、将发问能力全然出让给制度性问题的生存性认知构型。

[8] 本文提出的证伪条件，借鉴了批判实在论传统中关于社会机制解释可错性的方法论原则，即明确理论成立的条件并设想其可能被推翻的观察。

参考文献

- 布迪厄，皮埃尔.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中译本：《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 德塞托，米歇尔·德. (1980).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 Arts de faire*.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中译本：《日常生活实践》，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埃尔斯特，乔恩. (1983).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穆来纳森，塞德希尔，沙菲尔，埃尔达尔. (2013).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中译本：《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魏薇、龙志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森，阿马蒂亚.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贇、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